

嵌入与重构：扶贫车间对乡土社会的关系再造

——基于江西省的一个案例

刘岩 任大鹏 李凡¹

【摘要】：产业扶贫因其具备“造血功能”被认为是实现脱贫效果可持续的重要路径，“嵌入性”是理解扶贫产业及其所在的乡土社会间关系互动的分析框架，基于关系重构视角，以扶贫车间为案例，关注外部植入性扶贫工业类产业发展，探究其自身与乡土社会间的关系重塑，通过人情化管理机制、协调担保机制以及企业文化机制，与村庄的社会网络关系、利益联结关系、观念认知关系实现再造，重塑乡村产业结构、治理格局以及农民行为，从而实现扶贫产业的“本土化”运行，为今后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的产业与治理基础，丰富扶贫车间在全面脱贫攻坚胜利后的时代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关系重构 嵌入性 扶贫车间 乡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1)-01-0078(08)

一、引言

消除贫困是全世界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解决国内区域性贫困问题。自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相继提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异地搬迁扶贫”等一系列创新性扶贫举措，国内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而在所有扶贫方式中，“产业扶贫”是国家所提倡的开发式扶贫中的核心内容，具体指在政府主导支持下，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进行工商资本引入、产业开发、贫困户就业，从而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被认为是实现脱贫效果可持续性的重要路径。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关于产业扶贫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产业扶贫实施困境、特殊区域的产业构建、扶贫产业融资模式、产业扶贫中政企关系互动、扶贫产业与社会建设关系、产业扶贫的主体多元化以及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1~5]其中，在有关产业扶贫的参与主体研究中，有学者关注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6]另有学者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路径，^[7]而学界对于扶贫车间的研究与讨论还非常有限，“扶贫车间”这一形式便是产业扶贫思想与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相结合的有益探索，以产业建设来推动贫困户就业脱贫。具体来说，扶贫车间是指建设在乡、村，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为生产经营活动场所，以扩大贫困村集体经济、解决贫困人口就地就业为目的，以从事农产品初级加工、手工业、来料加工经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利模式。^[8]从时间维度来看，扶贫车间不仅仅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下的阶段性产物，因其具有在地化就业、低门槛限制、扶贫扩大化等优势，更将为乡村振兴提供一定产业基础，并不断吸引村民返乡就业。尽管一些新闻媒体对国内扶贫车间所取得的经验成效予以报道，例如王宇详细介绍了阜阳市扶贫车间的发展情况，当地采取保障车间质量、健全管理机制、打造特色产业、提高就业技能、创新运行模式等有效措施，对扶贫车间的推广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9]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女性就业，以此缓解农村性别结构性贫困问题，^[10]但目前并未有太多学者专

¹**作者简介**：刘岩 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100193
任大鹏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100083
李凡 讲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100193

家从学理性视角对扶贫车间这一形式展开研究，学术成果较为有限。

“嵌入性”视角最早是由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哈里森·怀特等人提出，利用社会理论来解释经济行为的运作逻辑。波兰尼指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社会过程紧密相联，人类经济活动嵌入于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决策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11]不少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活动要融于具体的社会网络、政治构架、文化传统、制度基础中，任何社会行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做出选择，并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12]本文所关注的扶贫车间案例是由政府牵头、工商资本领办，属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产物，作为一种外生性经济组织，其所有生产行为均发生在当地乡村社会内部，按照嵌入性视角的理解，这种经济行为将有机地嵌入到村庄的产业体系、治理结构、社会基础之中。在分析外部经济组织如何嵌入到乡土社会中时，陈靖曾引入“关联营造”概念，强调应该关注经济活动过程中如何建立、维持、调适并利用人际关系的创造性机制构建上面，由此超越“嵌入性机制”所呈现的静态、约束性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本文具有很强的研究启示。^[13]因此，本文从“嵌入——重构”视角出发，基于江西省的一个实地调研案例，研究扶贫车间如何成功嵌入到当地乡土社会中，又是通过何种动态调适机制与乡村实现关系重构，以此提升当地乡村多元化发展能力。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丰富当前扶贫车间的相关研究，也为后扶贫时代背景下更多扶贫企业与当地村庄的关系互动提供借鉴意义，由此巩固提升前期脱贫成效并为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工作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扶贫产业生成与案例介绍

1. 扶贫产业的生成

国内有关扶贫产业的利弊讨论一直从未停止，一方面资本下乡有利于带动地方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就业，实现贫困户脱贫与企业创收双赢效果；另一方面扶贫产业对当地资源环境的攫取与破坏以及产业引入不当而导致的“水土不服”等失败现象同样引发社会大众关注。从产业生成角度来看，扶贫产业主要包含村庄内部再生性产业和外部植入性产业两类，其中村庄内部再生性产业主要以原有农业产业为基础，在政府主导下，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企业组织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延伸产业链条、社会化服务供给等方式，为贫困户提供资本化收益，实现产业帮扶目标。这种产业类型较好地依托当地原有产业基础，以资本化方式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延伸出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服务业，贫困户接受程度高且社区嵌入性成本较低，因而在扶贫产业类别中占据较大比例。而外部植入性产业则更多基于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引入贫困地区，例如扶贫车间这一形式，具有在地化就业和技术门槛较低等优势，可以兼顾贫困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与家庭照料需求。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产业传统和基础，外部植入性产业在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组织形式、产业规模集聚条件、劳动力素质等层面与一般村庄内生性产业存在差异，贫困户需要存有一定时间的接受过程且整个产业嵌入成本相对较高，因而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成功推广率较低。

2. 嵌入乡土社会的扶贫产业：扶贫车间案例

扶贫产业的实际运营受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及村庄社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为确保产业的有机运行，除合理制定自身市场经营战略外，还需积极融入当地的乡土中，与当地社会环境实现有机融合。本文以扶贫产业与乡土社会的嵌入与重构为主题，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选取江西省上犹县鑫亿扶贫车间这一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与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相比，案例分析方法所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全面、详细且深入，分析的过程更为聚焦。本文的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访谈和实地观察，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针对当地的扶贫政策措施、扶贫车间运行机制、扶贫效果等问题，对上犹县扶贫办公室工作人员、工商联负责人、鑫亿扶贫车间厂长及20名车间务工人员人员进行访谈，结合村庄实地观察，更为深入地收集相关信息资料。

鑫亿扶贫车间位于江西省上犹县黄坑村，属于贫困县、贫困村。全村共有农户258户1060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380人，村内留守妇女、老人群体数量较多。截止2018年底，全村贫困人口78户290人，因病、缺技术、缺资金成为贫困户主要致贫原因。为加快黄坑村脱贫进程，上犹县工商联积极发挥当地商会作用，鼓励乡贤返乡投资办厂，鑫亿扶贫车间的领办者阳老板

便是其中一员。阳老板之前长期在广东从事电子产品加工行业，从业经验较为丰富，2017年受到当地政府邀请，选择返乡创业。同年8月选择在黄坑村成立鑫亿扶贫车间，该车间隶属于当地光电产业园的链条企业，该产业园区自身具有垄断性专利技术优势，因而拥有稳定的国内国外货源订单，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链接带动一批具有生产加工资质的扶贫车间作为其下游企业。本文所关注的鑫亿扶贫车间主要负责开展电子元件加工业务，为光电产业园提供产品组装、输送等服务。阳老板属于上犹县人，具有乡土优势，在当地政府和村干部协调下，租用村庄闲置的房屋作为扶贫车间厂房，可以容纳约60人就业，另有120人以居家加工形式参与，共计带动180人就业，其中包括50位贫困户在内。随着黄坑村扶贫车间经济效益的显现，阳老板继续扩大投资办厂规模，陆续在相近三个村庄开办新的扶贫加工车间，不断扩大用工规模，原则上优先雇佣当地贫困户群体，兼顾其他非贫困且具有就业能力的村民，其主要雇工对象为农村留守妇女和老人，年龄普遍在35~70岁之间。

鑫亿扶贫车间的阳老板具有丰富的车间管理经验，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扶贫车间员工管理的制度。在鑫亿扶贫车间就业的60名员工中，其中有两年轻妇女被雇为专职车间管理人员，负责其他员工的出勤考核、产品检测及结算等工作，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而其他员工以加工计件制为核算标准，根据加工产品类型不同，每个月的收入在几百元到千余元不等。除正式工资外，企业还会设置奖惩制度，对生产稳定或超额完成计件任务的员工进行一定的现金奖励，而对缺勤率高、计件效果差的员工实施扣除部分工资的惩罚；除采取正式制度外，阳老板还利用自身本土优势，采用人情化等非正式制度，私下劝解或从中调解以此解决扶贫车间内部员工的管理问题。同时，为了增强扶贫车间员工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确保企业具有稳定的就业员工数量，阳老板还多次组织员工外出游玩，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更加有利于扶贫车间的后续管理与发展。

三、嵌入性发展：与乡土社会的关系重构

精准扶贫政策资源的持续性投入为扶贫企业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直接或间接性支持，吸引外来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办厂。根据嵌入性理论观点，某种外界经济行为的有机运行，要融入到特定社会环境中。由于扶贫企业主体自身存在能动性，在嵌入乡土社会过程中，并非静态教条模式，而是基于自身与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性调整转化，由此克服“水土不服”“强硬嫁接”等弊端，为产业后续发展营造良好空间环境。基于此，本部分从“嵌入-重构”视角出发，关注鑫亿扶贫车间嵌入当地乡土社会的困境及后续动态调适过程，由此实现与当地乡土社会的关系重构。

1. 扶贫车间嵌入乡土社会的困境分析

扶贫车间作为外生性加工企业，独立于当地村庄现有产业范围之外。因而在政府引入该类型企业时，势必会与本土社会文化、产业基础、村民认知等方面产生交锋，如何有效认清并化解二者间的矛盾冲突，有助于扶贫车间快速融入当地村庄环境。在实际调研中，笔者发现，鑫亿扶贫车间在嵌入黄坑村过程中，遭遇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扶贫车间内部来说，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管理困境。由于扶贫车间与涉农产业性质不同，属于制造加工业，务工人员多为村内留守群体，鲜有外出打工经历，没有工厂化生产经验，且年龄结构、受教育阶段存在较大差异，难以接受并习惯企业管理、绩效考核等正式制度约束，主要表现在日常生产中的监督、管理及激励方式的不对称。此外，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农户较难适应规律的加工生产流水线工作，存在工业化生产需求与农业生产劳动力之间的矛盾，这些均对扶贫车间内部人员管理产生巨大挑战。鑫亿扶贫车间主要从事电子元件的加工，生产小灯泡、接线板之类的手工产品，以计件、称重为基本绩效考核方式，部分村民存有私欲，出现夹带外拿、以次充好等行径，对扶贫车间的生产管理成本造成额外负担。

从所处外部环境来看，扶贫车间的嵌入困境体现在村庄整体认知与治理层面。一方面村民对扶贫产业的环保程度缺乏足够清晰科学的认知，在以往传统认知中工业化生产会导致村庄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在带动村庄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对其环境造成负外部性影响。贫困村普遍尚未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自然生态环境保持相对良好，产业的空间转移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环境污染风险的转移。鑫亿扶贫车间领办者在创办之初，便遭遇村内干部和农户的质疑，扶贫车间的村级生产是否会对村内土地、空气、水资源等造成一定工业化污染，危害村民生活空间，甚至造成不利后果，受访员工表示，“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

无法甄别和评估产业的污染程度和可能性后果，宁愿选择受穷，也不愿意将“毒工业”引入村庄，后来在当地村领导的解释下才慢慢接受扶贫车间。”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在扶贫企业如何迅速融入当地村庄整体治理格局，避免企业自身人员管理方式与村庄整体治理模式间存在冲突，如何在短时期内取得村民信任、村干部支持，接纳产业迅速融入乡土社会环境等均是扶贫企业普遍遭遇的困境。鑫亿扶贫车间领办者虽为返乡创业人员，但并不属于黄坑村村民，村内人情网络相对局限。在创办初期，曾遭遇贫困户参与度低、务工人员短缺等困境，村民对工厂务工保有抵触情绪，担忧朝九晚五的工厂化作息会打乱日常农业生产节奏，唯恐自身技术能力难以符合用工标准。因此，大部分村民处于观望状态，实际务工人员比例较低。

2. 关系重构：扶贫车间成功嵌入机制

在扶贫车间日常运行发展过程中，其嵌入的乡土社会同样受到社会结构、治理结构以及利益结构转型而发生改变，甚至会产​​生上述嵌入性困境。基于此，鑫亿扶贫车间的阳老板发挥自身能动性，与当地乡村的居民、村干部以及内部员工之间重构起新的关系网络，建立起一整套扶贫车间嵌入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经济社会行为互动。

(1) 社会网络关系重构：人情化管理机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判断，中国的乡村产业会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乡土社会富有地域性，活动范围有地域限制，人与人之间依据血缘关系结合成地方社群，共同完成生产生活。^[14]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和民间秩序，形成村庄共同体，进而发展为关系共同体。因此，对外来企业主而言，除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外，还应融入人情化的管理机制，与村庄实现社会关系重构，建立新的乡土关系和情感纽带，有助于缓和企业与员工间的雇佣矛盾。

调研中发现，鑫亿扶贫车间的成功嵌入极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领办者本人积极主动地适应并融入当地社群关系，尽管阳老板并非黄坑村村民，但他却较好地利用同乡优势，尽可能调动起村内熟人资源，通过“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模式，逐步积累员工数量，形成一种较为稳固的合作生产关系。据阳老板介绍，扶贫车间内的务工人员主要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常驻户，另一类是散户，均具有明显的乡土社会特征。常驻户大多是村内的留守妇女和老人，在完成家庭农业生产任务外，可以长期在车间内务工，每月领取薪酬，因此成为整个扶贫车间的主要生产力；散户多是慕名而来的当地村民，因自身健康限制未能保障长期从事计件加工工作，受益程度相对较弱。在日常的员工管理过程中，除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外，领办者还善于利用员工间的乡土关系，以农民的“面子观”为突破点建立起“隐型”约束机制，在处理员工矛盾、懒散怠工、“藏货”等问题时，能够避免与员工正面交锋，而是通过熟人提醒劝说等方式，私下沟通解决，充分保全员工“颜面”，实现人情化管理。所谓“人情化管理”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委婉周到地把人之常情或人情世故予以充分考虑。^[15]李志强认为，人情化管理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核心是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管理者注重员工的个人内心世界和情绪，并根据员工情感的稳定性、倾向性和所具备的可塑性等特性进行相应的管理。^[16]内嵌于乡村的工商企业实施人情化管理模式，更加能发挥其所处的乡土社会优势，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相结合构建起更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有机嵌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中，确保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本土化”，从而保障扶贫车间的高效运行。

此外，阳老板在村庄中表现出尊老敬老、友爱乡民的姿态，给予员工情感关怀和生活帮助，具有人格魅力。例如，为老人提供重体力劳动服务、进城捎带必要生活物资等，对急需临时救济的家庭员工提供资金援助，以解燃眉之急。领办者依靠地缘关系，建立一种经济共享、情感体恤、日常照料等因素构成的利益互惠、情感互惠的企业管理模式。^[17]务工人员在空间范围内实现由“各自分散”到“集中劳作”，情感维度由“载载独立”到“相互依偎”，利用扶贫车间这一平台实现与外界沟通交流，满足自身情感诉求。基于上述情感互动，村民们普遍将阳老板视为“自己人”，改变原本市场雇佣关系属性，将车间务工看做是“帮熟人忙”，偷钱耍滑、懈怠懒惰等负面影响有所缓解，大大降低企业运行的管理监督成本。例如张某，65岁，现为鑫亿扶贫车间常驻员工，“儿子在外打工，家里就我和媳妇孙子，家里有重劳力农户需要帮忙时阳老板知道了也会前来帮忙，像帮自家亲戚一样，现在我和媳妇都在他这里打工，既是赚钱也算是帮他忙了”。正是这种人情化的管理机制，使阳老板与员工间建立起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认同感”，彼此视为“自己人”，改变原有纯粹的雇佣关系，基于社会情感关系的重构而增加新的内涵。

(2) 利益联结关系重构：完善协调担保机制，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扶贫产业作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发挥经济带动和社会脱贫双重效应。有学者认为，讨论产业扶贫应当将其放在精准扶贫与现代产业化双重背景下，但在实践过程中，地方的扶贫绩效考核政治化趋势明显，成为扶贫政治主导下的资本下乡。^[18]鑫亿扶贫车间的引入与当地政策支持力度密不可分，为吸引乡贤返乡、工商资本下乡，上犹县工商联在员工工资、技术培训、就业场所、创业融资、交通物流等方面提供多项政策补贴，为企业创设完善的外部运营环境，降低用工成本。外来产业引入村庄，除带动社区村民就业脱贫外，也推动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如集体土地资产盘活利用等。因而，扶贫企业在与就业员工构成利益共同体外，同时与村集体也实现经济关联，构建起利益联结关系。

如前文所述，鑫亿扶贫车间是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引入到黄坑村，阳老板本人与村干部并无直接关联，而是由上犹县工商联等组织牵引介绍从而实现与当地村干部沟通对接。对阳老板来说，在陌生的乡土环境中，利用村干部的村内权威与话语权与其形成协调担保机制，成为扶贫车间成功嵌入乡土社会中的“官方保障”。例如在前期市场勘探宣传、务工人员召集、消除村民环境污染疑虑等方面，村干部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市场经营主体，扶贫车间追求持续稳定收益，注重完善产品管理、市场勘探、风险规避等运营机制，有效推动入驻村庄的产业发展。阳老板正式决定入驻黄坑村前，在村干部协调下进行小范围的产品加工测试，观察村内妇女老人的接纳度，以此作为企业入驻的市场调研依据。由于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具有一定威信度，在号召贫困户务工方面具有话语权，借助村干部“熟人圈层”效应，确保务工人员具有稳定性。此外借助村干部作为产业发展担保人，确保不会对当地村庄环境资源造成危害，能够极大降低部分村民抵触情绪，打消怀疑不安等顾虑，使村民积极参与扶贫产业。

对村集体而言，外来资本的入驻，能够有效盘活村集体土地等资产，重新利用废旧村社建筑作为厂房，使潜在村级资源得以发挥价值，壮大村集体经济。村书记余某表示，“阳老板的这个扶贫车间，是我们村第一个外来投资办厂的企业，之前，村集体旧办公地点一直空着，阳老板一来，正好租用给他，每年的房屋租赁收入也能够为村里的集体经济提供一份支持，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企业来入驻”。外来扶贫企业通过租赁当地村庄房屋，通过空间转移将办厂地址由城市转为乡村，在节省自身经营成本的同时，盘活利用贫困村的集体资产，与当地村庄构建起利益联结机制，在资源合作、利益共享层面进行动态关系调适，伴随经济市场化和扶贫政治化实现双赢。

(3) 观念认知关系重构：打造企业文化机制，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受地理位置等因素限制，工厂企业大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城镇区域，农户往往以简单在地化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生计来源，并未过多以劳动力形式参与市场运作，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扶贫车间这一产业形式，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就近择业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因此，部分农户开始重新定义自我劳动力价值，逐步以受雇者身份进入扶贫车间，成为“农民+工人”双重身份。作为微型企业，所雇佣员工多为农民群体，行为模式具有农业社会特征，缺少工业化生产经历与认知。因而，阳老板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机制，重构农民对市场竞争、雇佣务工的认知体系，改变员工群体原有认知观念，激发起内生动力，进行自我价值再肯定。

企业文化具有增加企业内部凝聚力和扩大外部影响力双重功能，因而是企业持续经营经营的决定性力量之一。^[19]因此尽管扶贫车间规模较小，但领办者仍注重打造特色企业文化，以精神文化引领物质生产，形成互帮互助、互敬互爱、扶贫救济的统一价值观念，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树立以劳动脱贫为荣，以争当贫困户可耻理念，并在全社区范围内形成脱贫良好风尚，对部分“等、靠、要”思想严重的贫困户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贫困地区的居民生产和生活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农户相互参照进行农业生产，沿袭固有的家庭生活习惯，导致贫困区域在短期内难以从内部形成脱离贫困的动力，无法从低收入的泥沼中自拔。因此需要外部因素诱导贫困区域进行生产制度变迁，在实际运营中，阳厂长通过设置奖补制度，用经济规律、市场精神来说服贫困户积极参与，突出强调风险系数低、投入产出比高等优势，并利用农村社群环境强有力影响，通过“一带多”模式，辐射带动周围缺乏生产积极性的贫困户。对于贫困户群体而言，在扶贫车间内务工是与其本身的知识水平、劳动能力等特征相符的一种脱贫模式，在此过程中给予其充分的选择自由权，可以依据身体状况及时间安排，灵活调节工作强度，依靠自我劳动脱贫以此获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此外，领办者还会定期举行团队建设等活动，增进彼此间感情交流，组织车间务工人员外出参观学习、旅游观赏聚餐。一方面，能够增强车间务工团队凝聚力、向心力，有助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赋予务工人员归属

感、体面感，使其重新认识到务工的多重价值，而并非单纯的经济收入。

四、讨论与展望

据统计，全国目前约有 3 万多个扶贫车间，从业人员达 200 多万人，随着后续扶贫车间优势的不断体现，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有所增长。从功能属性来看，扶贫车间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进程中为促进乡村地区贫困人口就业脱贫而构建的产业类型，在有效发挥脱贫致富等社会功能外，能够拉动民营企业经济增长，拓宽市场发展路径与空间。尽管扶贫车间生成于精准扶贫时代，其功能价值的体现绝非局限于扶贫时代，从长期发展视角而言，扶贫车间作为外生性产业内嵌于乡村之中，对乡土社会既有产业结构、社会治理、农民行为等层面存有一定重塑空间，进而优化乡村整体性发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政策实施。

1. 村庄产业结构重塑

扶贫车间为乡村劳动力提供在地化就业，改变原有村庄单一化农业产业格局，实现以农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模型向农工一体化产业结构转变，重塑村庄产业结构。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十六字方针的首要准则，引入或构建因地制宜的产业类型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绝大多数农村以农业产业为主，工业化生产基础较为薄弱，一方面缺乏能人带领及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很难选择优势产业项目，以上共同导致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在上世纪初乡镇企业的兴起为广大农民群体提供工业化就业岗位，但后续衰败破产等造成农民依旧远离工业化生产。然而，单一的农业产业收入难以满足现代农村家庭的经济需求，不少年轻一代外出务工谋求生计，造成农村人力资本大量外流，更加速乡村凋敝进程。扶贫车间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除容纳贫困户就业外，同时囊括非贫困户在内，实现普惠式就业扶持，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优势资源回流，从而进一步为村庄产业结构转型奠定人力资源基础，提供更为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

2. 村庄治理格局重塑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提升，乡村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迫切寻求新的治理结构转型，除原有治理手段外，还需积极吸纳多元化治理主体力量。传统村级行政组织是村庄治理的权威所在，掌握全村的治理话语权，然而当扶贫车间等产业组织引入村庄后，其内部员工管理与村庄社会治理间会形成交叉重叠效应，以经济主体形式嵌入至村庄行政治理范畴内，重塑村庄治理格局，形成车间管理与村庄治理共存新局面。从整体而言，扶贫车间成功嵌入乡土中，以提供就业方式解决乡村贫困人口治理问题，以打造企业文化等形式营造融洽和谐氛围，推动农村社区乡风文明，在传统行政治理手段外，采用市场化经济方式规范当地村民行为，由闲散的劳动力集中为产业工人团体，引导农民群体向好发展，为乡土社会的整体化治理贡献力量。而从个体层面分析，以阳老板等为代表的新乡贤力量正在成为乡村新的治理主体，为乡土社会治理引入新的治理要素，村干部等为代表的官方力量与能人乡贤为代表的非官方力量逐渐汇聚融合，在村庄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弥补单一治理主体能力不足等缺憾。

3. 居民行为认知重塑

扶贫车间等外生性企业的引入，重塑原有农村居民认知观念与行为模式，对提升农民就业能力有积极作用。原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居民通过在扶贫车间就近务工，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为工业化集中生产模式，村民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化，由“邻里同乡”变为“同事伙伴”，改变传统身份关系认知进而转变自身相关认知理念，在原有社会网络中赋予新的关系内涵。农村居民通过参与产业链条中分工合作、业务互动等关联，打破原有农业生产过程中“各自为政”格局，从单一农业就业类型转而为农业+非农化模式。扶贫车间等企业的引入不仅增加农民就业决策选择机会，这种工业化产业还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民行为认知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其了解现代企业生产管理模式、市场化竞争机制等内容，增强自身就业能力。例如在参与车间生产过程中，市场化运营模式将会进一步加深村民风险承担意识、契约合作精神以及对产品标准化等问题认知，这种认知能力的提升将作用于农民自身产业发展中，为后续择业创业等奠定相关认知基础。

从鑫亿扶贫车间案例中可以看出,扶贫产业通过关系重构的动态调整方式与乡土社会进行有机嵌入,避免产生“项目孤岛”等悲剧,真正实现产业化发展与带动村户脱贫双重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对乡村产业结构、治理格局以及村民认知等层面进行新的空间重塑,实现双赢。然而在现实实践中,扶贫车间也会遭遇诸多发展困境,例如绝大多数扶贫车间就业员工缺少相关配套的劳动保障制度,难以有效保护员工自身劳动权益,为后续劳动纠纷等矛盾的发生埋下隐患,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乡村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而言,扶贫车间这一形式能够为乡村人口提供就近就业机会,维持家庭日常生计从而摆脱贫困,降低因大量人口外迁而导致的乡村凋敝速度,为乡村提供新的产业经济支持,在乡土社会中发挥诸多功效。如何进一步扩大巩固扶贫车间在乡土社会的多功能性发挥,顺利实现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时代的产业功能定位转型,更好的嵌入乡土社会并在更为广泛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关系重塑,成为未来研究的关注方向。

参考文献:

- [1]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
- [2]张跃平,徐传武,黄吉吉.大推进与产业提升:武陵山区扶贫的必由之路——以湖北省恩施州望城坡等地的扶贫实践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
- [3]徐翔,刘尔思.产业扶贫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经济纵横,2011,(07).
- [4]田雄,刘丹.泥淖之上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
- [5]匡远配,易梦丹.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培育:基于治理理论[J].农村经济,2020,(02).
- [6]陆继霞.中国扶贫新实践: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与内涵[J].贵州社会科学,2020,(03).
- [7]丁忠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J].改革,2020,(05).
- [8]陆继霞,吴丽娟,李小云.扶贫车间对农村妇女空间的再造——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J].妇女研究论丛,2020,(01).
- [9]王宇.阜阳市发展扶贫车间的意义及具体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8,(20).
- [10]苏海.让扶贫车间在促贫困女性就业中提质增效[N].中国妇女报,2019-08-13.
- [11]Karl polanyi,etc.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M].Chicago:Hernry Regnery,1971.
- [12]冯灿芳,张京祥,陈浩.嵌入性治理:法团主义视角的中国新城空间开发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8,(06).
- [13]陈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嵌入”乡土社会——关联营造的视角[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 [14]刘小峰.《乡土中国》之再检视[J].读书,2013,(06).

[15]梁俊山, 陈婷. 人情化管理: 概念、谬用及其改进路径[J]. 领导科学, 2016, (11).

[16]李志强. 人性化管理问题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 2011, (08).

[17]陈朋. 互惠式治理: 社区治理的日常运作逻辑[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 (05).

[18]陈义媛. 精准扶贫和农业产业化双重背景下的产业扶贫: 实践与困境[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02).